

□古代文学

走近上元年间的杜甫

——探杜诗的佛道思想

杨映红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系, 广东 汕头 515041)

[摘要] 上元年间,是杜甫晚年漂泊生涯中的一个歇脚期。这时期的诗歌,在情感内容上常常表现出佛禅的意趣和道家的情怀。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与生活际遇促成了杜甫有意往佛、道的世界里寻求解脱,但复杂的思想情感形诸于诗歌,反而更增强了杜诗忧患意识的力量。关注杜甫上元年间的诗歌,有助于加深对杜甫其人及其诗歌的认识。

[关键词] 杜甫;上元年间;诗歌;佛;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0)03-0100-06

通常,杜甫在世人眼中仿佛只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儒士形象,其实,他的思想构成是立体性的,并非一成不变。当遍阅人世沧桑、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的诗人生活有所安定时,佛道思想意识便不时浮上他的心头,并影响到其时的创作风调。这一点,在唐肃宗上元年间(760年闰4月至761年9月)的诗作中随时可以得到明证。本文试以杜甫上元年间创作的诗歌为镜,一窥老杜晚年诗中的别样情怀并探析其生成的主要原因。

一 乡居生活情怀中的佛道思想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关辅饥馑,对政治感到失望的杜甫终于舍弃了难以养家糊口的华州司功参军一职,携家随百姓逃难。“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十月,赴同谷。居不逾月,又赴成都。”^[1]几经辗转,杜甫于是年年底到达成都,在众多亲友的资助下,正式落户成都郊外的浣花溪。自上元元年初夏(760年,乾元三年庚子闰四月改元上元)至上元二年秋(761年,辛丑九月又改元宝应),这一年多里,杜甫基本无所事事,常流连于浣花溪草堂周边的山林村野之中,诗歌风调,也明显迥异之前和之后的流离悲歌。

佛禅的意趣,道家的情怀,在诗人回归家庭、回归大自然的生活中明显凸现。

(一) 幽居闲处中的淡泊与不争

且看诗人作于上元元年夏天的《江村》^①: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草堂建成了,诗人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也安定了下来,终于有空好好欣赏身边的环境了。你看,那绕村而流的清江,那来去自由的梁间春燕,那水中嬉戏的白鸥,那痴情专注的老妻,那天真无邪的稚子,都是那样的可喜、可亲 and 可爱,一切是那么的亲切与真实。“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这两句,既是点出了浣花村环境的静谧优美,分明也在传递诗人的一种“以自然、适意、清静、澹泊为特征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2]。经历了十载长安困居、四年宦海奔波的杜甫,终于在这里得到一个安定的栖息地,能与家人团聚,衣食也暂时无忧,这怎能不让他为此感到欣慰和满足呢?要知道,杜甫经营草堂,他自己是拿不出什么资本来的,全部来自亲戚朋友的资助。没钱,表弟王十五司马送来建设资金,需要栽桃,找萧八明府(萧

[收稿日期]2010-03-12

[作者简介]杨映红(1973-),女,广东澄海人,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在职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①本文所引用杜甫诗文皆引自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实)要,要种松树,去跟韦少府(韦班)拿,又从韦二明府(韦续)处觅来绵竹,果树不够了再找徐卿(徐知道)讨。吃喝也不用愁,“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①诗人颠沛流离生活刚去,所求无多,他知足于眼前的安定生活。

无官一身轻的诗人,“春来常早起,幽事颇相关”(《早起》)。闲看朝雨“风鸳藏近渚,雨燕集深条”(《朝雨》),雅赏晚晴“夕阳薰细草,江色映疏帘”(《晚晴》)。不仅如此,他看眼前的花木是“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田舍》),风雨中的虫鸟是“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之一),就连寂静的夜晚,也是迷人的“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遣意》之二)。只有心境澄明、宁静淡泊,才能静下心来观照宇宙万物,看花鸟虫鱼,感云淡风轻,这分明是佛家的境界。

上元元年(760年)是标志性的一年,闲居草堂的杜甫在与家人的朝夕相处中,似乎意识到,只有看淡一切,才能真正释放自己。他逐渐消减了原先儒家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消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共沉浮……”(《卜居》)林塘幽静处,蜻蜓水鸟都无虑无忧,又有澄江消解客愁,人还有什么尘事牵挂呢?有缘则为,无缘则罢,为则了之,不生牵挂。从此之后,杜甫的诗里时不时地会用佛法禅趣来开释自己,像《游修觉寺》中“川云自去留”句,仇兆鳌就评:“写得流行无碍,语涉禅机。”^[3]

而写于上元二年的《江亭》把杜甫淡泊不争的思想表现得更鲜明: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
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
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

“水流”、“云在”两句,写河水缓缓流淌不争喧,云也全都停止不动,这使他竞争的心思和飞驰的意念都消失了。禅宗以“欲得心净,无心用功”为其要旨,这两句物与情融,神与景会,禅宗意味更加浓郁。王嗣奭《杜臆》就说:“居然有道之言。盖当闲适时,道机自露,非公说不得如此通透。”仇兆鳌也评:“二句有淡然物外,优游观化意。”又评:“此章云‘欣欣物自私’,有物各得所

之意。”^[4]孙昌武先生也认为:“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那种处患难不惧不馁,保持心灵的平静和谐的精神正是通于禅的。”^[5]

(二)“道法自然”中的返璞归真

人来自于自然,又将归于自然。自然作为人类永远的母亲和最终的归宿,给予人类的不只是物质资料和精神安慰,它还提示人们去寻求自我存在的意义^[6]。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庄子也说:“山林欬!皋壤欬!使我欣欣然而乐欬!”(《庄子·知北游》)《江亭》起首“坦腹”、“长吟”两句写诗人恣意自适的行为举动,那种不羁与潇洒,已颇有道家的自由精神意味。《漫成二首》更具体地写出了诗人回归自然的生活情形:

野日荒荒白,春流混混清。
渚蒲随地有,村径逐门成。
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
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其一)

江皋已仲春,花下复清晨。
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
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
近识峨眉老,知余懒是真。(其二)

在这里,诗人不再有“社稷苍生”的牵挂,只是尽情享受当前生活的快乐。“眼边无俗物”,唯见“野日”、“春流”、“渚蒲”、“村径”、“江皋”、“花下”等等这些天然的农村景物,也无须顾及世俗礼教,就是“披衣惯”,“漉酒生”也不会有人指指点点。心无挂碍的诗人陶醉于大自然中,以至于“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仇兆鳌评:“次章(其二)随时适兴,申前章(其一)未尽之意。前章上四句,说花溪外景。此章上四句,说草堂内景。前章披衣漉酒,乐在身闲,此章读书对酒,乐在心得。末云‘懒是真’,总不欲与俗物为缘。”^[7]顺应自然,超脱俗世,这分明是道家的生活情态了。

在广阔的大自然面前,人无论平常怎样浮躁,也会变得幼稚如小孩。《绝句漫兴九首》写于上元二年,九首诗的内容,由春至夏相继写出。且看前三首:

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

^①参见《王十五司马出郭相访遗营草堂赏》、《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诣徐卿觅果栽》、《酬高使君相赠》等诗,见《杜诗详注》第727-734页。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
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着人。

第一首，写春不解风情，诗人化身为一个不服气的小孩，以“无赖”责骂春色，以“深造次”责备花开过于轻率，以“太丁宁”指斥莺语的太唠叨；第二首，依然是写春天恼人的境况，说春风欺负我野老墙低，夜来居然吹折了数枝花，言下之意，这造物似乎也欺负人呢；第三首，写频频飞入草堂书斋里的燕子扰人的情景。我的茅斋低小好筑巢，连江上的燕子都知道，所以“故来频”。燕子频频而来，自然引起主人的烦恼，更可气的是，燕子筑巢衔泥弄脏了琴书不算，还要追捕飞虫甚至碰着了人。王嗣奭《杜臆》诗此云：“远客孤居，一时遭遇，多有不可人意者。”这种不可人意，是由客愁生发，借燕子引出“禽鸟亦若欺人者”的感慨。笔者倒觉得，这是诗人童心童趣回归的直接反映。三首短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可爱的杜甫形象。

人生不如意事常多，处处在意就苦了自己，还是以自我的生命为重。因而《绝句漫兴九首》第四首就说：“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诗人既是自解也是解人。你看：“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五）江边无主的桃花美极了，诗人不知爱深红的好，还是爱浅红的好，欢喜得不得了，天真如小孩。又如：“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等等。杜甫这种真性情的回归让苏轼也很喜欢，《东坡诗话·书子美黄四娘诗》云：“此诗虽不甚佳，可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故仆喜书之。”^[8]

“居善地，心善渊”，诗人在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中把自然和自己的心灵打通，忘情于山野，这让他获得既往生活里不曾有过的美好审美体验，也让我们触摸到了诗人的真性情一面。

（三）怀古幽思中的无常感

草堂地处偏僻，社会达人罕遇，能寻访的名胜

古迹倒不少，它们多少也消解了诗人心中难释的一些郁结。杜甫无比景仰推崇诸葛亮的贤相风采，草堂刚定，就去寻访武侯祠：“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杜甫非常钦羨刘备、诸葛亮这一对前代君臣的际遇，“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那是怎样的一种君臣关系呀。而忠诚的诸葛亮，还是无法逃脱历史命运的摆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孔明不复有，如今映入眼帘的是荒凉的祠堂：“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自然永恒，人生却不永，贤能又得知遇如诸葛亮者，也不过尔尔。他登上琴台，凭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遗迹：“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琴台》）想当初，一曲《凤求凰》，文君为琴音所动，夜奔相如。一个文弱书生，一个富户千金，为求真爱而勇敢冲破世俗礼教。他们的相知与勇气，多教人追怀歆羨啊！可如今空见琴台，相如、文君安在？“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相如、文君这对千古知音，已无复再来了。

怀古幽思，让杜甫伤今之余也感悟到人生无常、有求必苦的佛禅真谛。

（四）“戏”作中的狂士风韵

杜甫的“戏”题诗共有28首，而据仇兆鳌《杜诗详注》所按，写于上元宝应（761-762年）之际的就有11首。这些“戏”题诗颇能见出杜甫的狂士风韵。《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与《戏为韦僊双松图歌》都是杜甫写给友人的题画诗，诗人用词夸张，语带调侃，生动再现了两幅图画的恢宏气势，读来赏心悦目，令人称奇。《戏作花卿歌》戏谑的对象是唐朝武将花敬定，史载其人曾平定叛乱有功，但“恃勇，既诛子璋，大掠东蜀”（《旧唐书·高适传》）。想必身在蜀中的杜甫清楚其人底细，诗中云：“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李侯重有此节度，人道我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话中有话，读来尽是讥刺语。在《戏赠友二首》中，杜甫更是毫不客气地直批两位友人的不自量力：“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书。自夸足膂力，能骑生马驹。一朝被马踏，唇裂版齿无。壮心不肯已，欲得东擒胡。元年建巳月，

官有王司直。马惊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駉骀漫深泥，何不避雨色。劝君休叹恨，未必不为福。”焦校书郎“自夸”自己力大无穷，能骑尚未驯服的生马，事实却是“一朝被马踏，唇裂版齿无”，他甚至连马都未能骑上，就被马践踏于蹄下，嘴唇开裂，牙齿脱落；王司直则“马惊折左臂，骨折面如墨。”更可笑的是，那个焦校书郎还嘴硬，扬言要到战场上去擒拿敌人，叫人笑破肚皮。《戏为六绝句》是一组论诗诗，诗人寓严正笔意于轻松幽默之中，品人论诗，侃侃而谈，庄谐杂出，显出别样的风趣。这些直接标明戏作的诗歌，吟咏对象尽管不同，但都明显带有戏谑之意，幽默中凸显出道家的狂放不羁。

（五）嗜酒中的及时行乐

文人多好酒，杜甫也不例外，而且诗酒相随，“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可惜》）；“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愁”（《落日》）。有了酒，可以忘却一切忧伤。卜居草堂的杜甫“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漫成二首》其一），“把酒从衣湿”（《徐步》）。他意识到时不可返，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绝句漫兴九首》其四），“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水槛遣心二首》其二），“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巢燕养雏浑去尽，江花结子也无多。黄衫年少来宜数，不见堂前东逝波”（《少年行二首》）。这些写放怀畅饮的诗句，与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将进酒》）、“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何其相似！在饮酒放浪中，杜甫宣扬及时行乐，慨叹人生无常。

二 杜诗佛道思想凸显的原因

仅仅一年之隔，安居草堂的杜甫，心态已明显不同于逃奔路上的秦州、同谷时期。笔者以为，杜甫上元年间诗中佛道思想的凸显，离不开以下几方面：

从社会思潮来看，唐代儒、释、道思想兼容的社会背景对杜甫思想的影响应是最直接的。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往往左右着人们（特别是士人）的生活理想、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里。儒、释、道思想的交融，可以说是唐代

思想的基本特点。唐代的佛教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天台、三论、法相、华严、禅宗等教派已逐渐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禅宗，已经深深契入中国文化之中”^[9]。唐代文人相当普遍地受佛教的熏染，杜甫也不例外。而杜甫与佛教的结缘，有一部分还来自家庭。天宝元年（742年），杜甫为其姑母所撰写的墓志云：“爰自十载已还，默契一乘之理，绝荤血于禅味，混出处于度门。喻筏之文字不遗，开卷而音义皆达，母仪用事，家相遵行矣。”（《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杜甫的姑母虔心佛教，早年寄居在姑母家的他，从小就受到佛教的熏陶。所以孙昌武先生认为杜甫对佛教“一生中始终保持着持久的热情，而且佛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确实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从总体看，佛教固然带给杜甫某些消极影响，但他却能够汲取佛教特别是禅宗的积极成分，给自己的思想和创作增添许多新鲜内容。”^[10]唐代也是中国道教文化史上的兴盛期，道教更被奉为国教。众所周知，道教以老子的思想为主要教义，道家认为生命最高的价值在于因循自然地完成其自身的历程，将因循自然看成是生命的最佳状态和应有的存在方式，而道教则在道家学说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倡人们应关注现世，发展自己的个体生命。道家与道教概念性质不同，但在宗旨上，其实同一，那就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强调重生，强调守真。杜甫生活前期曾经一度对道教炼丹驻颜，悠游自在的生存方式有狂热的愿望。他的道教情结，可在其写忆李白的《赠李白》、《忆昔行》等诗中找到根据。而身处道风浓郁之地域者，往往由于耳濡目染，也会引起对道教的兴趣。杜甫卜居草堂，他的南邻“朱山人”就是一位道士，离成都不远，就有著名的道教名山青城山。上元二年秋，杜甫初登青城山，作有《丈人山》：“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气浓，缘云拟住最高峰。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容。”颇有游仙之意。崇道的社会思潮遍及李唐王朝的庙堂与山野，杜甫就是要避也避不了。不过，道家与道教的思想在杜甫身上是融合在一起的，两者很难完全剥离，对于上元年间的杜甫来说，道家的思想更为突出些，并且还时跟佛禅交融在一起。当然，社会思潮对于文学的影响，最终还要通过士人心态的变化来实现。

从生活实际讲，人生确实多艰，自诩“奉儒”

的杜甫需要寻求儒家之外的另一种精神安慰。杜甫的一生，与唐王朝由盛转衰、万方多难的剧变息息相关，生命的难以承受之重，让杜甫实在不堪重负。“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的杜甫希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可是当他带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美政理想远赴长安求仕时，却一再碰壁。十年长安，收获的唯有辛酸，“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与他的不凡抱负形成鲜明的对比。好不容易得来的官职又因官场的争斗而次次失意离弃，这让他对“儒术”不免产生怀疑：“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

历尽磨难的诗人，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先后遭受着“政治的失意，亲朋的离弃，漂泊的无奈，以及老病的痛苦”^[11]，于是他只好退守，对自己的心灵和肉体进行维护。刘长东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隐逸思想大多皆因用世不得而产生，并且其产生有着这样的轨迹，即用世不得而转向愤世。愤世不过是徒然增加自己的痛苦罢了，于是又转向避世乃至忘世。这在哲学上就表现为从孔子儒学走向道家庄学。”^[12]文学即人学。道家关注个性生命自由的精神，佛家的人生空幻虚无观，成了杜甫艰难的人生行走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调节剂。

就自身个性而言，杜甫也不是纯粹的儒家乖乖仔。《旧唐书·杜甫传》说他“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新唐书·杜甫传》说他“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他身上“褊躁”“傲诞”的性格特征与儒家“温柔敦厚”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那是道家思想影响下任性使气的性格表现。《狂夫》里他自嘲“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并非全是虚言。古语说“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在无须顾忌礼教的大自然里，人也最容易把他更本真的一面展露出来。远离政治、地处偏僻的浣花溪村，完全可以用它的虚怀，把杜甫内心里“狂”的一面诱发出来。

再者，中国古代士人往往以“狂”自居，这种“狂”实质上是对自身人格真实与独立的维护与追求^[13]。在“假隐士”充塞于时代的盛唐，上元年间的杜甫自言坚持“真隐”。《独酌》诗云：“薄劣渐真隐，幽偏得自怡。本无轩冕意，不是傲当时。”能以幽偏之地怡情养性、陶然自乐，即是“真隐”。不过，作为一个深刻了解自身与民族苦难的诗人，杜甫尽管有陶渊明般决然隐逸之思，但

“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式忧患终究难以完全抛弃，因而，诗人便借“戏”作来偶露狂士的峥嵘。所以笔者赞同这样的认识：“杜甫是狂人，然而与魏晋狂士阮籍相比，杜甫的狂表现为政治上的狂傲，阮籍的狂则多表现为‘痴’，即对礼的褻渎。二者的形成均有其社会原因。杜甫亦具有闲逸情调。与陶渊明相比，陶选择闲适的田园生活是选择生命的永恒价值，而杜甫则为关心政治之余的闲适生活体验。”^[14]事实上，杜甫是极为敏感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仅仅一场秋风的捣蛋，就把杜甫的隐逸意识给撵回去了。

三 结 语

顾随先生说：“诗人是寂寞的，哲人也是寂寞的；诗人情真，哲人理真，二者皆出于寂寞，结果是真。诗人是欣赏寂寞，哲人是处理寂寞；诗人无法，哲人有法；诗人放纵，哲人约束。故在中国，诗人与哲人势同水火。但大哲人也是诗人，大诗人也是哲人，此乃指其极致而言之，普通是格格不入的。”^[15]按此说法，杜甫是大诗人，也是大哲人。上元年间的杜甫居幽处偏，几乎与世隔绝，从某个角度讲，他是寂寞的，但他不但能从直接感性的角度去热爱眼前幸福欢乐的生活，而且能从更高，更深的理性角度去揭示与体味苦难艰辛的生活，他既情真，他也理真。杜甫虽然受佛道思想影响，但他没有成为道士，也从未遁入空门，骨子里儒家思想仍然占主要地位。所以，尽管“时间有馀论，未怪老夫潜”（《晚晴》），有着“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的佛家体味，终究还有“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江亭》）的同时性忧伤；一场秋风，就把杜甫的儒家忧患意识给唤回来。在中国诗歌史上，能像杜甫这样做到情、理俱真并行而不悖的并不多。

“诗歌创作有时修是完全属于感情的需要”^[16]，佛家清净无欲的理念，道家自由自然的追求，给杜甫身心带来安宁，也为他诗情与理想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道家的自由精神、佛学的清净无求同诗人儒学思想相互激荡融合的结果也更增强了他忧患意识的力量。“这种内在的潜力使杜甫诗歌无论是整体上还是个别篇章都产生了在现实

的内容基础上的浪漫化倾向，他的诗歌创作也就成了理想与现实有机结合的典范，并对后人产生着积极的影响。”^[17]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佳人》）上元年间的草堂生活，对杜甫而言，只是其漫长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安魂小驿站，他只是进来歇一会，安抚一下心灵而已。有人说，诗人是流云，是落叶，飘无定所，任意东西；这是诗人杜甫的宿命，也是哲人杜甫的宿命。浣花溪草堂是杜甫梦想的寓居，然而这些系不住飘泊的宿命、停不下那颗驿动的心，一旦外界有了大动静或是家国有所需，他又惶惶然上路了。所以，杜甫诗中的佛道思想，始终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并非杜诗创作的主流。

[参考文献]

- [1] 闻一多.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A]. 闻一多撰, 傅璇琮导读. 唐诗杂论[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69-71.
- [2] 葛兆光. 禅宗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93.
- [3][4][7] 仇兆鳌. 杜诗详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786、801、798.
- [5][10] 孙昌武. 杜甫与佛教[J]. 东方论坛. 青岛大学学报 2005, (4): 46-43.
- [6] 王晓骊. 宋代山水词的哲学意蕴[J]. 古典文学知识, 2006, (4): 41-45.
- [8] 苏轼. 东坡诗话·书子美黄四娘诗[A]. 陶宗仪. 说郛(卷八十一)[C].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9]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06.
- [11] 杨映红. 孤独者的悲歌——杜甫漂泊西南时期孤独心态探微[J]. 川北教育学院学报 2002, (1): 23-25.
- [12] 刘长东. 论杜甫的隐逸思想[J]. 杜甫研究学刊, 1994, (3): 21-22.
- [13]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05.
- [14] 孟修祥, 董武. 论杜甫之狂、逸与礼佛[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03, (3): 53-55.
- [15] 顾随, 叶嘉莹. 驼庵诗话[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 [16] 张成恩. 从“任情率真”到“兴寄讽喻”——论李杜诗歌创作思想的演绎发展[J].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5, (4): 66-69.
- [17] 刘峰. 植根现实沃土中的理想之花——儒释道与杜甫的诗歌创作[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1): 44-46.

[责任编辑：雪豹]

Approaching Du Fu in the Period of Shangyuan in Tang Dynasty ——Probing the Buddhist and Taoist Thought in Du Fu's Poetry

YANG Ying-hong

(Department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Shantou Polytechnic, Shantou, Guangdong 515041, China)

Abstract: The period of Shangyuan is a rest stop for Du Fu in his late years of vagrant life. His poetry in this period expressed his interest in Buddhism and Taoism. The specific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life experiences pushed Du Fu to seek relief from Buddhist and Taoist worlds. However, the complicated thought and feelings expressed in his poems contrarily strengthened Du Fu's sense of misery. Attention to Du Fu's poetry during Shangyuan period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Du Fu himself and his poetry as a whole.

Key words: Du Fu; Shangyuan period; poems; Buddhism; Taoism